

“故园荒芜”：“数字死亡”的记忆与遗忘^①

方 惠 吴尚蔚

【摘 要】本研究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出发,聚焦中国社交平台上的“数字死亡”,即个体用户的平台账号被关闭的现象。本文的经验材料包含131份网上发布的数字生命叙事和39份深度访谈,这些遭遇强制性删除后的个人书写和言说不仅将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公之于众,也将其公共化。研究发现,封号作为事件侵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死亡般的沉痛和创伤,个体数字记忆被全面删除,(一部分)自我也被湮灭和剥离。诉诸书写是抵抗遗忘的方式,抗议平台加诸的越轨标签,被封号者的身份和主体性也在书写中得以重构和确认。从结果上看,通过删除制造遗忘的平台治理反而在社会实践中激发了积极的记忆铭刻,而删除给技术化的记忆结构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则值得深思。

【关键词】封号;数字记忆;遗忘;平台治理;反记忆

【作者简介】方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journication09@gmail.com;吴尚蔚(通讯作者),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电子邮箱:shangwei1992@gmail.com。

【原文出处】《国际新闻界》(京),2023.10.28~4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介记忆视角下香港通识教科书的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1CXW021)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8月15日,一位21岁男子从腾讯用户接待中心顶楼坠亡。在其生前自拍的一段视频中,该男子谈到自己的微信账号因不明原因被封,多次申诉失败,找人工客服亦无果,前往腾讯总部讨要说法,却未能进入。^②这是国内第一例因网络封号而引发的命案,也在网上引起了较大的讨论。同一时间前后,大量关于封号的个人言说在数字空间涌现,让我们得以窥见极端个案之外的隐匿人群。

封号作为内容审核的极端形式,指的是网络平台以违反服务条款为由,对用户账号进行永久封禁,体现为账号功能的部分或全部封锁,以及个人记录的部分删除或清空。这种做法近几年来在国内外互联网平台的操作中都相当常见。国外平台Facebook、YouTube先后启动算法内容审核系统,并对被判违规的账号采取内容删除、地理屏蔽、账号关停等举措(Thach, Mayworm, Delmonaco & Haimson, 2022; Gorwa, Binns, Katzenbach, 2020),其中最为轰动的莫过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Twitter账号被永久封禁,其违规

内容也被删除。商业平台亚马逊也在2021年以“反复滥用评论行为”为由封禁了600个中国品牌销售,共计约3000多个卖家账号。此外,封号还成为国际舆论博弈中降低目标国家内容可见度的方式,比如Google、Facebook、Twitter等公司多次封禁中俄等国在该平台的社交账号(张志安,杨洋,2023)。

国内平台近几年来也针对流量造假、网络暴力等乱象展开了一系列监管行动,以维护社会稳定,弘扬向上的社会风气(孟超,2023)。作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Chen, Kaye & Zeng, 2021),网站平台的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被强化,《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版要求平台与用户承担双主体责任,平台对网络内容直接进行把关与审核,及时发现与处置违法违规信息或行为。据统计,2021年度被处置账号有13.4亿个,被封禁主播有7200余名,^③广泛分布于新浪微博、微信、豆瓣、知乎、抖音等平台。

本文考察个体用户在遭遇平台封号之后的网络书写。通过对131份数字生命叙事(digital life narrative)

和39份深度访谈的分析,本文从记忆与遗忘的理论视角来理解作为平台治理方式的封号对于数字时代个体与自我的影响。我们试图通过质性文本和公共言说,探讨个体如何书写账号被“清理”的经历、如何追忆账号对于自身的意义,以及删除对于记忆结构的影响。

一、数字记忆:“衰变时间”的终结?

记忆与遗忘、保存与删除是数字记忆研究的核心(Lagerkvist, 2018)。数字化的记录、存储、归档、备份等技术供应与文字、音频、视频、图片等形式供应带来了媒介和记忆之间的新型关系,中介着人们的记忆实践(Keightley & Pickering, 2014; Migowski & Araújo, 2019),重塑了整个记忆生态(Garde-Hansen, Hoskins & Reading, 2009: 13-14)。社交媒体是理解这种记忆生态发生转变的关键环境(Migowski & Araújo, 2019),它以用户生成内容为基础,引导发布和分享,将以往作为私人情感表达和个体自我反思的日记逐渐转变成成为在线自我写作,使得大批量的个人记忆生产成为可能,并衍生了互动、展演、隔离等多种连接实践(Urban, 2022; Van Dijck, 2007),从根本上改变了记忆是什么以及记忆和遗忘的可能性(Hoskins, 2018: 7)。

已有研究详细讨论了记忆数据的外部化、公开化与算法化,包括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与线上遗骸(digital remains)(Bassett, 2022)、被遗忘权(Stainforth, 2022)、算法布局对于个体记忆的重新配置(Jacobsen, 2022; Migowski & Fernandes Araújo, 2019),均指向了数字时代“衰变时间”(decay time)的终结(Hoskins, 2013),即过去不再褪色或泛黄,而能够通过种种唤醒机制在当下重新焕发生机。

但事实上,数字资产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脆弱(Van House & Churchill, 2008)。Brügger(2018: 75)指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生活经验:“我们时常会发现,昨天或一年前某个网络内容不复存在,它们已经被移易、更改或者删除。”个体记忆的生产、传播与保存受制于技术、用户/使用、商业模式、所有权和管理等多个行动者(Van Dijck, 2013),它们给个体记忆带来了不可控的外在风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当平台倒闭时,使用者的数据往往会被清理,或不得不迁移到其他替代性平台上。关于这种情形, Yang和Wu(2018)讨论了消逝了的中文网站,总结了网站被关停的三个原因:发布了被认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

信息,被认定为非法或色情网站,或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另外, Internet Histories 2022年的专刊在讨论平台死亡案例时也提到,用户个人的数据与帖文往往随着网站关停而消失。Wayback Machine、豆坟等归档工具与备份插件的兴起也从反面验证了数字资产的脆弱性(Ogden, 2022)。

另一种类型是平台仍然“健在”,但有权审核内容、处置账号。删除、禁言、封号均属此类。Are(2023a)叙述了自己的TikTok和Instagram账号因发布钢管舞视频而被删除的经历,以及维权过程中感受到的“自动化的无力”(automated powerlessness)。内容审核和与去平台化已然作为制度性的一环,构成了中外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部分,但其透明性的缺失和投诉渠道的不畅通给边缘内容创作者带来了不稳定性(Are, 2023b)。正如 McCammon 和 Lingel(2022)所指出的,网络平台与使用者往往存在着不对称的控制关系。如果对此种控制关系疏于考察,数字记忆永存的可供性愿景就只能如镜花水月般虚幻。

在数字记忆研究版图中,从理论到法律规则,“被遗忘权”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关注,而作为硬币另一面的“被记忆的权利”却少人问津(李欢,徐偲骥, 2023)。本文试图从“封号”这一为国内外社交平台广泛采用的治理方式入手,考察其中记忆外部化对于个体的意义,其潜在风险,以及个体与平台之间的博弈。

二、删除、遗忘与“数字死亡”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删除及随之而来的遗忘在人类信息史上由来已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将知识的遗失划分为三个过程:隐藏、摧毁和抛弃,既包含当权者的有意为之,也包含了旧知识让位于新知识的“创造性毁灭”(伯克, 2012/2016: 158)。互联网时代的删除同样包含了网站关闭、内容迁移、用户“主动的短暂性”(proactive ephemerality)(Ringel & Davidson, 2022)以及平台施加于用户的强制性删除,后者正是本文的讨论主题,因其关乎权力边界、数字遗产等重要议题,也催生了新的记忆与遗忘模式(McCammon, 2022; Kula, 2014)。

保罗·康那顿(Paul Connerton)罗列了抑制性清除、规定性遗忘、结构性失忆、屈辱性沉默等七种古往今来的遗忘形式。康那顿聚焦于其中的类型学差异,认为文化记忆研究普遍预设了记忆是一种美德,

但遗忘也有其适应性和功能性,对遗忘的考察应当围绕国家、政府、社会、文化和家庭等具体能动者实施的具体行为展开(Connerton, 2008)。Wessel和Moulds(2008)则致力于从心理学角度统摄遗忘类型差异背后的共性,即通过提取或删除,遗忘在塑造和维持集体身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封号制造遗忘作为互联网平台的治理方式,也被视为规范互联网发言、扼制不良内容的有效方式,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举措,甚至形成了规模化的内容审核产业链条(参见罗伯茨, 2021/2023)。Tulving(1985)将遗忘路径划分为两种:限制可及性(accessibility)与可得性(availability),这对于互联网治理也同样适用:限制可及性主要是通过关键词过滤、搜索过滤等干扰性策略提高信息的搜寻和获取成本,让记忆因为不可及而被遗忘;限制可得性则是利用内容删除和账号封禁等手段,让记忆不可得、不可用。

封号不仅针对具体帖文,往往还会波及发帖者个人“耕耘”的其他内容,因此这种平台遗忘机制对于普通用户具有震慑效应。一方面,正如诸多媒体报道^④的,平台的算法识别系统存在“伤及无辜”的可能,而封禁程序不透明、申诉渠道不畅通、政策上的后台实名制原则以及“严管违法违规账号‘转世’”的规定都对账号的寻回与再申请带来重重阻力(张志安, 2022)。另一方面,相关的话语治理术以一种隐蔽且非暴力的形式让被封号者整体性地蒙上了越轨者的标签,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抗争的表达与传播。正如贝克尔(Howard Becker)所说,越轨是他人执行规范和判断的结果,是标签化的建构产物,其内部有诸多差异性,无法一概而论(贝克尔, 1963/2011: 8)。因此,本文并不讨论封号案例背后的原因及合理与否,用户被封号的过程及其对规范和判断的反应,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将个体用户的封号经历概念化为“数字死亡”,这一概念出自本文所分析的一份自述材料,^⑤并在访谈和其他自述材料中被反复确证。与生物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相比,“数字死亡”是针对数字世界而言的,指的是个人被剥夺了在互联网上的生存权利(罗讚, 2020)。与线下亡者的线上遗骸、数字来生等讨论逝者的媒介在场研究不同,“数字死亡”是一种反向隐喻,是现实生者在某一数字平台上的“死去”。“数字死亡”的原因可能包括网站倒闭、注销账

号、技术更新导致账号与数据丢失等,在本文的语境中,它特指由互联网平台对用户账号施加的永久封号。实际上,在线平台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死”来描述其兴衰(McCammon & Lingel, 2022),这套隐喻系统甚至被官方话语所采用。^⑥因此,可以说,“生死”是数字化生存的核心隐喻,它将账号具身化,并形塑了我们对于技术系统、治理规范和社会关系的想象。

已有研究较多从中观与宏观层面剖析了政府与平台的治理思路、方式与举措(何明升, 2016; 张志安, 冉桢, 2022)。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者视角,它提供了一种主导性的叙事框架,但却可能忽略另一方的声音,遮蔽关于平台封号合法性与透明性的激烈争论。因此,关注被封号者的讲述有助于平衡平台监管原则与用户权益,促进网络监管政策的完善。在理论上,已有记忆研究中存在明显的“进步偏见”(Gutman & Wüstenberg, 2021),即英雄需要铭记和缅怀、邪恶则需要被淡忘和抹去(Brockmeier, 2002)。但越轨者也可以开展记忆活动,因此,秉持价值中立,探查越轨者的言说与主张能够扩大记忆研究的光谱,丰富我们对于记忆实践和偏差行为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

本文所搜集到的自述经历,相比于这一群体的实际规模而言微不足道,但它们散落于互联网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而被整合、被挪用、被诠释,将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公之于众,也将其公共化,甚至形成了集聚效应,为我们窥探互联网时代的过去与现在、官方与民间、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一扇窗口。

本文从两个层次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记忆面向考察“数字死亡”:第一,如前所述,社交媒体早已超越交流和网络平台的功用设定,扩展为个人记忆的存储设备(Jacobsen & Beer, 2021),而封号让这些记忆存档与数据关系荡然无存,由此催生了大量关于个人社交账号及其生命史的回忆。那么被封号者如何追忆失去的账号?社交媒体账号对于用户意味着什么?第二,书写过往对于维系个人的身份感、连续性和方向性至关重要(Bernsten & Rubin, 2012)。被封号者的网络言说是一场零散但有意识的自发的话语实践,那么被封号者如何看待自身的书写?本文的研究意义有三:第一,在强调数字记忆与保存的互联网时代,考察删除与遗忘是对技术逻辑的去蔽,从而将权

力关系带回数字记忆研究的视野;第二,本文聚焦于被封号者的言说,在主流话语和平台叙事之外呈现个体的声音,展现“记忆的微光”(李红涛,杨蕊馨,2022);第三,关注“数字死亡”不仅因为我们和被封号者同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数字环境中,还因为网络是互联的存在,与他人的联系与纽带也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他者的“数字死亡”也会导致“我”的一部分消失(Vallely, 2019)。因此,这一议题涉及的是数字语境下根本性的关系危机。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时间段为2019年8月至2022年12月。数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研究者以“封号”“炸号”等关键词在网络中进行搜索,共获得131篇^⑦的数字生命叙事,叙述者均以第一人称详述了他们社交媒体账号的“数字死亡”经历。和传统自传不同的是,数字生命叙事受制于技术逻辑的影响,其性质、结构和形式也有所变化,它糅合了自我表达和自我展演(Kreknin, 2018)。因此,第二,为了和公开的言说形成互补和参照,2020年2月份到3月份,针对一些较短的封号言说,研究者分别私信发言者,征求访谈的机会,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累积了39份在线深度访谈。基于两种方法所获得的170个样本^⑧中,79个是新浪微博封号,51个是微信封号(包括个人号和公众号),19个是豆瓣封号,其他封号分布于抖音、B站、QQ、Instagram等平台,此外还有多例多平台封号和同平台重复封号的样本。研究通过质性软件ATLAS.ti编码完成,自述和访谈分别单独编号,并以“类型+编号”的形式在分析部分呈现。

四、研究发现

(一)作为事件的封号

对于大多数自述者而言,封号是作为一个“事件”突然闯进他们的生活的。大量关于封号的记忆书写都始于个体生命历程中极为稀松平常的生活,工作、学习、旅途中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事件在突发的瞬间中显现,毫无征兆地中断了日常节奏。“上班第一天,微信炸号了,不是小号,收到提醒的时候是一脸懵逼的,理由是 rumors,时间是 forever。”(自述15)“一年后,在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夜间突然醒来,当我打开QQ想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回消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封号了。”(自述27)“大号的死,是2月末的一个早上,我毫不知情,它灰飞烟灭。”(自述48)。

“炸号”是被封号者赋予封号的形象化表达,“像一个烟花一样,啪的一声就没有了,然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访谈29)微信封号的征兆是被强制登出,弹出的是“账号处罚说明”的界面,提示用户被封禁的原因以及类型,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他们的封禁类型都是“限制登录,不可解封”。而微博则“并没有出什么理由,甚至没有一条系统的提醒或者通知,通过其他账号看,我被炸掉的号主页上显示的是‘该用户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访谈11)

封号往往伴随着账号的登录、收发消息、点评转赞等功能不同程度的失灵,比如微博被封后虽然能够登录个人主页,但只能查看每条历史发表记录中的前140个字,图片及长图文均因“加载失败”而无法查看,其他功能则几乎全部瘫痪。“虽然在手机中还是可以正常浏览那个账号无论是自己还是关注的人发布的每一条微博,但是却无法更新、转赞评和互动,他人查看我的账号主页时便显示‘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已无法查看。’”(自述63)“我怕我退出后就登录不回去了,所以一直不敢切号。”(访谈22)微信则只有在提取资金时才具有临时登录的权限。“因为转移余额我得以暂时登录,可以接收信息,但无法回复,可以刷朋友圈,但不能点赞评论更不能发表内容,可以看到公众号文章标题,但是无法打开文章,社交账号失去了所有社交功能。”(自述34)豆瓣则“不能发言,日记,书影音,小组,私信,全部不能发言;你之前发过的帖子,全都不存在了,所有的动态,别人也看不到了;甚至你的账号,也没办法搜索到了。”(自述96)B站被封后同样“不能投硬币、不能互动了、不能分享了,且是永久都是这样,而且手机号和邮箱也不能解绑。”(自述97)作为一种惩罚机制,不同平台的封号表现虽然因时因事而异,但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被封号者在数字公共空间和社交圈层中不再可见。

齐泽克(2014/2016: 13)认为,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封号冲击着人们关于个人数据归属、互联网平台权限、数字记忆能供性的多种认知,由此带来了种种震惊体验。“昨天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我是难以置信的,而后真的有心

脏骤停呼吸困难的感觉,一下子就哽咽了,只能靠大喘气来保证正常呼吸……”(自述91)“这种心痛马上蔓延成一种巨大的笼罩式的荒谬感:一切都是虚无,没有什么能够留存——即便是号称只要上去就不会消失的互联网。”(自述81)

尽管封号导致的事实状态趋近一致,但是它给当事人带来的情绪体验却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事件对于主体的意义差异。主体处于事件的中心,越用心经营、账号与生活的联系越紧密,越缺乏预期的被封号者越容易感受到震惊和不满:“刚刚炸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万万千的不知名情绪——愤懑、难过、溃烂、无力、表达欲完全被抽空的绝望……”(自述39)而早有心理预期的网友,当这一刻真正到来,则表现得更为从容。“我心平气和,坦然受之。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早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我有一种可谓阴暗的心理平衡,许多比我有才、比我勇敢、比我粉丝多得多的人,早就先走一步了。”(自述53)是否诉诸书写也体现了这一事件给被封号者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情绪波动。2号自述者经历了微信公号 and 微博的多次被封,“到了2018年的2月27日,按理说我不应该为封号惊诧了。可我还是有点发蒙。事实上,我毫无防备。”

封号的事件性还体现在其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了封号言说的语言层面。齐泽克(2014/2016:113-116)认为,政治与社会现实向我们强加了物理意义上的外在暴行、“非理性”破坏、社会一象征层面的暴力这些外在侵扰与创伤,粗暴地毁灭了主体身份的象征肌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封号通过一套文明的治理话语将个体合理地驱逐出数字表达空间,其方式是让标志着个体数字身份的ID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与他人互动,甚至清除了过往的历史发表记录与聊天记录。就象征层面而言,这是暴力与污名的双重创伤。被封号者也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身体与死亡隐喻体系来形容此种创伤,在可说性上赋予其一个位置,让它变成了可说之物(蓝江,2020)。具体而言,他们将线上账号隐喻为物理上的人体,线下实体隐喻为灵魂,那么被封号即意味着“一种‘死亡’,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社交性死亡’”(自述108)。“号没了的时候,那感受真是一脚踏入了赛博棺材,如果说我之前注销掉的那是个小号是体体面面,那这次就是被活埋呀。”(自述17)线下

生命虽在延续,但个体却感觉自己沦为了幽灵。“我的微博就像死了躯体的游魂…别人看不见我,我能看见别人,但是我们无法触碰到对方,这不就跟鬼一样的存在吗?”(访谈35)28号自述者细数了自己在微博上的五次死亡,最后一次仍然是毫无征兆、悄无声息:“在微博友邻的艾特中,我得知了自己的死讯,但我像一个发不出任何声音的幽灵,什么也回应不了。”这样的创伤隐喻是系统性的,包含了对于平台(杀戮场、猪圈)、账号(身体、伴侣)、封号行为(枪毙、死刑)、账号状态(灰飞烟灭、僵尸)等的分支隐喻(Fang & Wu, 2022),以理解生死来理解封号,将创伤体验具身化,更易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共情。“网络世界的惩戒比现实世界的惩戒要严厉多了,现实世界里被处以极刑也不会不允许你立个碑,网络世界就直接白茫茫世界真干净,一夜之间仿佛你不曾存在过。”(自述21)

(二)追忆账号:湮灭的记忆、关系与自我

齐泽克认为,当作为主体的人遭受创伤性侵扰之时,其结果往往是全面的毁灭。在死亡中重生的是毫无连续性的新主体,它是自闭、空洞而纯粹的(齐泽克,2014/2016:111-116)。在被封号者的书写中,也能看到封号事件对个体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创伤,它来自封号对于个体数字记忆的全面删除和对(一部分)自我的消灭。

“故园荒芜”,6号自述者如是形容其被封号后的微博。新浪微博于2009年推出,曾一度是中国最为活跃的数字公共领域,吸引了大量用户长时间驻扎。“那个‘我’并不仅是一个账号,而是真实承载了我七年的生命记忆……从2011年5月13日到2018年6月11日,我合共发了6881条微博,平均每天两条多,还有近3000张配图……我的微博,不仅是我的生活日记,更是我的生活本身。”(自述6)这些平台建构了“分享”(sharing)的神话,积极鼓励用户生产关于自我以及社会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帝国,但是封号却无异于一次决绝的“割席”(John, 2016)。“消失的不是一串代码,是一部分活生生的人、几年间日常的记录。”(自述24)“四年多的时间,三年多都是凌晨三四点以后睡觉,400多万字的心血,弹指间灰飞烟灭,而且非常彻底,连素材库一起消失了,也不能导出任何文字,一个字都不行。”(自述8)此外,相比在多平台“游牧”的用户,那些“定居”在单一

平台上的用户受到的创伤尤为深重。一位曾将豆瓣视为精神寄托的网友写道：“从09年注册开始，十二年的时间，几乎覆盖了我全部的互联网记忆。我几乎不用微博，不用贴吧，没有抖音快手，只有这一个豆瓣账号，大概八成时间都在刷豆瓣；几乎不发朋友圈，只在豆瓣写东西，也存在于这个账号里；上千条书影音标记，几百条短评，几千条动态，一夜之间全都没了。”（自述65）能够提及过去对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或身份认同举足轻重（Bluck, Alea, Hbermas, & Rubin, 2005; Conway, 1996），而社交媒体早已成为用户记录个人生活、保存数字记忆的重要工具，堪称个人的数字档案（Cannelli & Musso, 2022）。“多数时间里它只是我的日记本，但日记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那些不可言说的微妙小心思，我把它留在这一边，期待未来某一天能回去看，可惜它已经没有未来了。”（自述103）互联网技术强化了记忆，同时也赋予了公众忘却的权利，让外在技术成为记忆代理，个体得以腾出“空间”来面对其他挑战（埃斯波西托，2021: 227）。但封号却是这种记忆代理风险的一次极端暴露。正如29号自述者所说：“每次炸号后，都会考虑沙上写字的意义。”

社交媒体账号不仅是个体情感的共振，还是一种沟通世界的信号，在时间与空间中与自我及他人保持联结，并反过来形塑自我。对于微博、豆瓣等基于弱关系联结的社交应用而言，平台几乎是用户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方式。在88号自述者看来，封号轻而易举就摧毁了这种联结，也销毁了“艰难地寻找自由对话的经历”。尽管发布的帖子、头像都还在，但是私信却都被删除。“那一刻我的心真的在滴血，这个微博账号是我从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开始使用的，有很多日常的回忆和最真实情绪的记录，也有很多哪怕没有当面见过，但却因为相似的困境认识的朋友……”而在微信交流的另一端，生者的幻象仍然存在，交流的失败则极易被单方面地理解为“在忙”或是“傲慢”：“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你死了世界以为你还活着。他们依然可以正常地向你发送消息，所以在世界眼里你没有任何异常，但是你却无法回复消息……”（自述118）封号让个体成了名副其实的“亡灵”，其发出和接收的一切都是潜在的死信，无力对于交流的邀请做出任何回应。

至于超级平台微信，自2012年推出以来，在中国

的社会语境下它越来越近似一种强迫性的应用，家人、同事、朋友乃至陌生人等几乎所有的人际互动都离不开微信（Zhu & Miao, 2021）。本文所收集的样本中约30%的封号发生在微信平台上，“我的微信号用了超过八年，积累了近五千个联系人……逃离都没那么容易，因为决定人们是用什么社交软件的并不只是软件本身，而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哪里。”（自述38）而大部分微信被封号后都会面临恢复联系与重新加回好友的困难。“我一边通过通讯录发送好友申请，一边打电话给几个社群的关键人物，让他们加上我新微信然后拉我进群和大家广播。”（自述34）“我还有一个200多人的群，我是群主，当我让同群的人把我拉回这个群的时候，发现完蛋，要群主同意才能进群，而我被封的号是群主，我回不去了。”（自述80）15号自述者甚至专门出了一篇教程教授如何快速恢复好友，但也只能是导出好友名单和聊天记录，然后一个个手动添加。在这过程中，很多人会再次经历被污名、被质疑、被调侃的创伤体验。

当然，大部分被封号者会第一时间寻求申诉，并通过客服热线、12306、工信部等渠道来维权，但当这些渠道并不畅通时，愤怒与无力的创伤体验会进一步加重。“我先狂打微博客服电话几十次，在微博客服中心试着点遍了所有的问题，终于发现连接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生气更无助了。”（访谈31）“我居然有了轻生的想法……在我发现自己即使尽了全力也无法留住时，我真的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动力。”（自述90）

社交媒体和自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作为一种“我技术”（me technology），社交媒体以个体的自我关注和形象展现为核心，早已成为个体身份用具（identity kit）的重要组成部分（Goffmann, 1961; Varis & Spotti, 2011）。因此，很多封号言说都将账号与自我关联起来。“那一天我真的觉得自己的一部分随着那个账号死去了。”（自述28）“每一次炸号都像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被剥离。”（自述19）虽然在线生活是离线生活的拟态，但其对于线下关系的强烈锚定反而拓展了实际的、心理上的，甚至是肉体上的身份认同（章戈浩，2020）。“只要网络中的某个‘分身’使用得足够久，它差不多就已经变成了‘自我’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在互联网上耗费的时间越久，这种建立在虚拟空间中

的体验就越是深刻而迫近于真实。”(自述93)在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社会里,社交媒体提供的不仅是展示自我、书写自我的机会,还是一种关乎存在和主体的技术,被强制裹挟的个体化为节点主体实现“在世存有”(孙玮,2015),正如自述20的帖子下一位评论者点出的:“现在人的存在方式是网络,想让人消失就是抹去网络痕迹,如同抹去人的记忆。”账号消失带来的深层次的主体性危机在微信和豆瓣的封号言说中尤为明显,后者作为标记与分享图书、电影、音乐的社区,自2005年成立以来,被很多用户视为自己的“精神角落”;而脱离了网络,节点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仅有的链接被掐断了,甚至找不到掐断的人,也找不到重新链接的渠道。生命像断崖一样,突然塌了一部分。”(自述87)“还是被一种空洞的感觉打倒了。仿佛在豆瓣上我已经有了一个人格,有的话不在这说我也不知道在哪说…”(自述60)这种遗留问题表明,人作为一种主体间构成的身份分布式地存在于多种环境之中,包括肉身的和虚拟的,即自我不仅存在于有机物之上,也存在于社交媒体之上,存在于他人的大脑、文本等其他介质中(Stroke,2015)。

(三)抵抗遗忘:作为反记忆的书写

对于创伤体验,个体层面的主动遗忘往往被心理学家视为一种必要而积极的修复过程,它有助于克服干扰,抑制消极情绪(Storm,2011)。但在本文所研究的封号言说中,书写作为一个表达的出口,被有意识地运用以抵抗遗忘。“我希望用我的文字,为历史留个见证。”(自述6)“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第一天有人为我鸣不平,第五天可能就没人记得我了。我没那么重要我知道。然而我心里的委屈和压抑却是不能不写一写的,否则我真的受不了。”(自述37)如果说封号作为抑制性清除的遗忘方式是隐秘而不被公众察觉的,那么这些言说则是在邀请观看者进行“情感见证”(affective witnessing),他们以个人感受为中心,集中书写了个人体验的遭遇、体现、情感及其强度(Richardson & Schankweiler,2020),为自己曾经存在过的数字生命留下一丝缥缈如烟的记忆。

不过,在抵抗遗忘之外,书写还承担着额外的使命,即洗雪或抗议封号事件强加于身的社会污名。在此意义上,书写具有一种“反记忆”(counter-memory)的意涵,即记录被封号者的经历,将其置于多个相似的

或冲突性的历史之中(Tello,2022)。这些封号言说致力于在治理框架之外发展出异质性的叙事,并试图将其作为抗争方式,向偏差污名提出辩驳。“失去联系人、失去大量生活记录只是个开始,随之而来的时间、精力的消耗简直令人心力交瘁…我无法忍受让这种无意义的经验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任凭它不断腐蚀我的力气,所以我必须写下来,作为一种反击。”(自述38)

在平台话语之中,被炸账号涉及传播色情低俗、网络暴力等负面有害信息,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事实上,很多被封号者也面临着此种质疑,并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和屈辱感。“听说我微信被封禁后,一位同学第一反应是,你这个人有点危险啊,你一定干了什么坏事。”(自述1)一位实习生的领导在得知其被封号之后反复询问“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以及是否有过“异常的举动”(自述34)。为此他们得到了诸多“谨言慎行”的善意劝诫,“我妈劝我不要传谣信谣,也不要转发。”(访谈2)

因此,封号书写往往伴随着极尽详细的原委描述与解释,以作为对于越轨话语的回应,也是对自身的正名。这些话语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也是最为常见的类型是对于平台管理条款的含糊不清提出质疑。一位用户曾公开致信腾讯表达抗议:

你们第一次封我的微信号时说的是“该微信账号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在我申诉之后给我的回复是“您的微信账号经核实存在传播未经证实的内容或违法违规内容”。前后两次回复,内容有很大差别…但是两次均未说明我的微信中到底是哪一条内容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法规中的哪一条。(自述41)

另一位用户的抖音账号被炸后,客服建议其提交反馈,“但因为我不完全搞不懂哪里违规,这种‘证明没干过’怎么证明?”(自述72)这类言说直指平台的权责边界,并激发了行为艺术式的抗争行动:一位豆瓣用户的大号、小号以及新注册的号在短时间内先后遭禁,报以同情的网友组织了一场线上活动,号召网友将豆瓣用户名改成该用户大号,并在后面加上数字,同时鼓励参与者将头像换成这位被封禁者的头像,转发并呼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自述46)。如果说以往通过社交媒体壮大舆论声势、挑战权力结构是维权的重要方式,那么在封号事件中借由平台上的

个人叙事实现抗争尤为困难。一是如果炸号是因为发布或传播违规信息,那么用户在平台上公开发帖抗辩的时候,需要援引自己发布过的“违规”内容,这类帖子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会和其账号一样,在互联网中销声匿迹。二是其抗争的对象——社交平台,往往恰是维权赖以集结和组织动员的工具。换言之,抗争工具和抗争对象在封号这一个案中合成了一体。这一过程体现的是脆弱且失衡的平台-用户关系:“我愤怒和恐惧的最大缘由在此,不要说权利,用户创造的一切都是草芥,都可以随时消失,连‘技术原因’的搪塞都不必有。”(自述20)

第二种则倾向于解释自己是因平台操作的失当而被封号。一位用户以委屈的口吻写道,“天呐,我什么都没做啊,‘机器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就凭借几个关键词而不看我的上下文语境就把我给误杀了。”(自述107)这些被封号者中,不乏平台治理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肯定治理的正面意义,但将自己被封号的原因归咎为平台审核机制不透明以及机械地执行了管理规范。“说起来我不是什么色情博主,六百多条微博发了三四张展示身材的照片就算色情了?”(自述120)“微博的计划没错,初衷和目的没错,平台需要管理,需要净化,没有错…可这计划里,这群私房博主不应该沦为‘炮灰’。”(自述31)通过划定边界,这些言说将自身与平台要整治的对象区分开来,从而获得抗争的正当性。

第三种则将封号视为一种行使正义所付出的悲壮代价。尤其在涉及社会重大议题时,“尽绵薄之力发声是公民权利和‘职责’。”(访谈5)这些表达认为互联网平台应当是公共领域而非私人企业,他们诉诸表达的公共性。“我严肃反思了自己因懒惰和怯懦而放弃书写更多文章的不作为,也重新为我所理解的公共写作确定了一个基础——以个人见证历史。站在这个基础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膨胀(或萎缩)的自我,从而得以在公共空间中自持。”(自述38)这些用户披露的个人信息相对较少,其所动用的公义、自由话语使得这类记忆话语尤其突出,更易实现跨平台地流通,也更易获得可见性。

个体叙事的力量,源自于它以个体的眼光和经验来讲述社会性的问题和话语(杨国斌,周海燕,2022)。通过文字诉说不平,通过叙事召唤共情,这

种民间个人证言冲击着平台的污名叙事,生产出了关于封号的反记忆。这种反记忆不是简单的目的论的或二元论,也并非要与平台的管理政策相抵抗(如上述第二种话语就倾向于支持政策话语),而是作为异质性的存在映证、挑战和监督着前者。可以说,反记忆话语与平台政策话语之间充满着紧张和微妙的张力。三种叙事内部展现了被封号群体的复杂性,其中的分化体现在,相比于在线访谈者的普遍冷静与平淡,公开的数字生命叙事更倾向于表达愤怒与痛苦,其悲情形象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印证了已有的研究,即身份和主体性是在日常的身份实践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Eakin, 2014),数字生命叙事是当个体的互联网身份遭到否定时的一种应激反应,记忆经历了重新整合与再造,被封号者的身份和主体性在书写中得以重构和确认。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删除抵达遗忘是社会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人们赋予事物以意义来记忆,也通过限制或改变事物的意义来诱导遗忘(Hirst & Yamashiro, 2018)。在互联网世界中,删除信息、封禁账号、关闭网站等都是制造遗忘的方式。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公司通过识别色情低俗、网络暴力、恶意营销等违法违规信息,以封禁账号惩戒性地来删除和屏蔽越轨言论与主张,进而实现遗忘。

本文驳斥了“衰变时间”终结、数字记忆永生的流行看法,并在本土的封号语境中阐释了数字记忆的脆弱性。在平台与用户不对等的关系下,过于依赖记忆存储外化的技术承诺,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的状态、帖子、文章、与他人建立的互动与关系作为行动和思想的结晶,都是与自我有着密切关联的身份装备。但这些都在平台封禁中被损毁,个体失去了处置它们的自由。换言之,个体的数字存在被泯灭,对于高度依赖某一数字平台的用户而言,此举无疑摧毁了用户的自我身份(如果不是一部分)。这些“死亡”一般的体验,突出地体现了社交媒体已然构成人的维度之一,所承载的关系与联结以及其作为记忆代理所具有的存储和分享功能造就了一个自我生成的语境,个体在其中通过耕耘关系与内容来编织自我。正如Stroke(2015)所说,“删除社交媒体等于

削弱人的存在,减少此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分量,从而危及此人在大千世界中的生存时间和丰富性。”在此意义上,永久封号所具有的死亡意味超越了语言修辞而成为一种本体事实。

但遗忘与记忆往往处于辩证与互构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数据的删除并不一定会导致遗忘,就像表征、存储和存档并不一定会导致记忆的增加一样(Hoskins, 2013)。就本研究而言,通过封号制造遗忘的同时也生产了记忆。封号激发了大量个人回忆与抗争叙事,打破了以往关于互联网永久连接与记忆的美好幻象。“数字互联网的伟大在于,可以方便地储存一切,也可以方便地删除一切。只要一个晚上,你五年、十年的微博数据,你讲出的话,po过的图片,分享过的视频,全都不见了。”(自述22)这些记忆实践可以被视为用户应对“数字死亡”的调试方式:以不妥协的姿态,抵制删除而导致的遗忘。Web 2.0的技术能供性让个体被推到讲述和解释事件与现象的前台,放大和见证了个人的“数字死亡”,从而提供了一种与平台话语对峙的民间叙事。他们痛陈封号事件给个人带来的失联,给身心带来的创伤,造成的记忆与自我的湮灭。他们控诉互联网平台及其审核机制,生产出别样的互联网治理叙事。与平台的污名叙事不同,封号书写积极寻求自我的合理性,对于互联网平台的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提出了质疑。在此过程中,被封号者也塑造和生成着独特的身份认同,即质疑的、悲情的或正义的公民形象。相比大多数沉默的被封号者,这些书写出来的封号言说尤为突出,当它们被选择性地传播到更广阔的网络空间中时,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外界对于中国平台治理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封号是互联网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它仍然需要制度的约束和限制,并完善平台规则和反馈路径,而不应当让国内外舆论成为用户不得不诉诸的工具。

删除与消音、沉默与遗忘,作为记忆的对立面,一直是难以被捕捉的研究领域——相较于记忆的有形,它们往往是不露痕迹的。本文所研究的这些个人书写最终也可能被汇入遗忘的大流里,因为除了极少部分会诉诸法律,大部分被封号者本身就缄口不言,或者经历在有限的抗争之后不得不承认封号的现实,继而通过新建账号、平台迁移等方式重建

受损的自尊(Wu & Fang, 2023),但这种消极调试也助长了平台封号的常态化。仅就经验观察,近年来关于平台封号的言说在减少,而本研究收集的很多贴文后来也都被作者或平台所删除——换言之,封号逐渐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平台管理模式而渗入集体共识。饶是如此,遗忘形成的过程仍然值得关注。Kula(2014)曾主张理论化删除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他认为,删除是一个涉及多方主体的社会过程,最终会通过人类与数字工具之间发生的个体化过程而被铭刻在技术环境中。相比Kula所讨论的个人信息删除行为,社交平台封号的权力意涵无疑更为明显,留待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更加深刻:如果删除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数据管理模式,技术化的记忆结构中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模式?如果在共同构成我们存在的数据中嵌入了盲点,我们将如何接近并探寻数字时代的文化记忆?

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社交平台的删除行为涉及后台数据的处理,需要考虑程序、语言、软硬件等技术要素,限于篇幅,这些数字时代的记忆元数据并未得到充分讨论。此外,本文所讨论的“数字死亡”主要集中于新浪微博、微信和豆瓣等社交平台。在分析中,平台间的性质差异对于书写的影响是本文着墨较少的地方,平台定位与技术架构的不同是否影响了个体的言说,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平台的封号机制尤其是封号的判定标准以及封号后账号功能(历史存档、私信等)的差异也需要来自局内人的观察视角。

注释:

①本文初稿曾在“数字记忆:共同体想象与再造”工作坊(2022年9月21日至22日)宣读,得到了参会同仁及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②凤凰网(2020)。21岁男子微信被封号后坠亡!警方已介入,腾讯回应...检索于<http://finance.ifeng.com/c/7zHdwWJJPYP>。

③澎湃新闻(2022)。10大问题,集中整治!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87362。

④新闻媒体报道如,澎湃新闻(2020)。微信是用来服务用户而不是“管理”用户的。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910082。中视之窗(2019)。法律学者怒批腾讯霸王条款,微信粗暴封号实为蔑视用户权益。检索于<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Lu3AjbB>。

⑤金方廷(2021)。历数我遭遇的几次“数字死亡”:真实与虚幻终将走向。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95929。

⑥中国网信网(2021)。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检索于 http://www.cac.gov.cn/2021-09/15/c_1633296790051342.htm。

⑦有网友针对封号书写的系列叙事在本研究中均被整合成一篇。

⑧有些账号经过申诉之后账号功能与权益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正常。

参考文献:

- [1]艾琳娜·埃斯波西托(2021)。《社会遗忘:系统论的路径》,载于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读本》(李恭忠、李霞译)(第237-24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彼得·伯克(2012/2016)。《知识社会史》(下卷)(汪一帆、赵博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3]何明升(2016)。中国网络治理的定位及实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7),112-119。
- [4]霍华德·S.贝克尔(1963/2011)。《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张默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5]蓝江(2020)。面向未来的事件——当代思想家视野下的事件哲学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150-158。
- [6]李红涛,杨蕊馨(2022)。把个人带回来:数字媒介、社会实践与记忆研究的想象力。《新闻与写作》,(2),5-15。
- [7]李欢,徐德骥(2023)。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数字时代网络用户的“被记忆权”研究。《新闻记者》,(5),62-74。
- [8]罗澍(2020)。网络暴力的微观权力结构与个体的“数字性死亡”。《现代传播》,(6),151-157。
- [9]孟超(2023)。网络内容规范中的隐喻和想象:对政府和互联网平台的话语分析。《新闻记者》,(6),46-56。
- [10]斯拉沃热·齐泽克(2014/2016)。《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11]莎拉·罗伯茨(2021/2023)。《幕后之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内容审核》(罗文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12]孙玮(2015)。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12),5-18。
- [13]杨国斌、周海燕(2022)。互联网中的个体叙事、社会结构与集体认同。《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3-16。
- [14]张志安,冉桢(2022)。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路径、效果与特征。《新闻与写作》,(5),57-69。
- [15]张志安,杨洋(2023)。互联网平台对国际舆论博弈的影响:机制与趋势。《新闻与写作》,(2),25-34。
- [16]章戈浩(2020)。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死亡盲点:一个生存媒介研究的视角。《全球传媒学刊》,(7),21-34。
- [17]Are, C.(2023a)。An autoethnography of automated powerlessness: Lacking platform affordances in Instagram and TikTok account deletion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5(4), 822-840。
- [18]Are, C., & Briggs, P.(2023b)。The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impact of de-platforming on creators at the margins. *Social Media+Society*, 9(1), 1-12。
- [19]Bassett, D. J.(2022)。The cre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digital afterlives: You only live twice.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20]Bernsten, D., & Rubin, D. C.(2012)。Understanding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1]Bluck, S., Alea, N., Habermas, T., & Rubin, D.(2005)。A tale of three functions: The self-reported uses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ocial Cognition*, 23(1), 91-117。
- [22]Brockmeier, J.(2002)。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rrative as cultural memory. *Culture & Psychology*, 8(1), 15-43。
- [23]Brügger, N.(2018)。The archived web: Doing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4]Cannelli, B., & Musso, M.(2022)。Social media as part of personal digital archives: Exploring users' practices and service providers' policies regarding the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memories. *Archival Science*, 22(2), 259-283。
- [25]Chen, X., Kaye, D. B. V., & Zeng, J.(2021)。#PositiveEnergy Douyin: Constructing "playful patriotism" in a Chinese short-video appl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1), 97-117。
- [26]Connerton, P.(2008)。Seven types of forgetting. *Memory Studies*, 1(1), 59-71。
- [27]Conway, M. A.(1996)。Autobi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D. C. Rubin(Eds.)*Remembering our past: Studies 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pp. 67-93).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8]Eakin, P.(2014)。Autobiography as cosmogram.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6(1), 21-43。
- [29]Fang, H., & Wu, S.(2022)。“Life and death” on the Internet: Metaphors and Chinese users' experiences of “account bomb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1-21。
- [30]Garde-Hansen, J., Hoskins, A., & Reading, A.(2009)。Introduction. In J. Garde-Hansen, A. Hoskins, & A. Reading(Eds.). *Save as... digital memorie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31]Goffmann, E.(1961)。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s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NY: Anchor Books。
- [32]Gorwa, R., Binns, R., & Katzenbach, C.(2020)。Algorithmic content moderation: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automation of platform governance. *Big Data & Society*, 7(1), 1-15。
- [33]Gutman, Y., & Wüstenberg, J.(2021)。Challenging the meaning of the past from below: A typolo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memory activists. *Memory Studies*, 15(5), 1070-1086。
- [34]Hirst, W., & Yamashiro, J.(2018)。Social aspects of forgetting. In M. L. Meade et al.(eds), *Collaborative remembering: Theor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5]Hoskins, A.(2018)。The restless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mory. In A. Hoskins(Eds.). *Digital memory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36]Hoskins, A.(2013). The end of decay time. *Memory Studies*, 6(4), 387-389.

[37]Jacobsen, B. N.(2022). Algorithms and the narration of past selv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5(8), 1082-1097.

[38]Jacobsen, B., & Beer, D.(2021). *Social media and the automatic production of memory: Classification, ranking and the sorting of the past*. Bristol, UK: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39]John, N. A.(2016). *The age of shar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40]Keightley, E., & Pickering, M.(2014). Technologies of memory: Practices of remembering in analogue and digital photography. *New Media & Society*, 16(4), 576-593.

[41]Krekinn, I.(2018). Digital life narratives/digital selves/autobiography on the Internet. In M. Wagner- Egelhaaf(Eds.). *Handbook of autobiography/autofiction*(Volume 1: Theory and concepts)(pp. 557-564). Ber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42]Kula, E.(2014). Deletion practices in the era of permanent digital memory. *Fast Capitalism*, 11(1), 47-59.

[43]Lagerkvist, A.(2018). The media end: Digital afterlife agencies and techno-existential closure. In A. Hoskins(Eds.), *Digital memories studies: Media past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44]McCammon, M.(2022). Tweeted, deleted: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US government's digital memory holes. *New Media & Society*, 24(3), 741-759.

[45]McCammon, M., & Lingel, J.(2022)Situating dead-and-dying platforms: Technological failure, infrastructural precarity, and digital decline. *Internet Histories*, 6(1-2), 1-13.

[46]McCammon, M., Ruan, L., Miltner, K., Gerrard, Y., Montalbano, K., Mikołajewska-Zajac, K., & Márton, A.(2021). What dead-and-dying platforms do for Internet studies: Situating technological failure, digital afterlife, and the web that was. *AoIR Selected Papers of Internet Research*, 2021.

[47]Migowski, A. L., & Araújo, W. F.(2019)."Looking back" at personal memories on Facebook: Coconstitutive agencies in contemporary remembrance practices. *Journal of Aesthetics & Culture*, 11, 55-63.

[48]Ogden, J.(2022)."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can be saved": Archive Team, Tumblr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web archiving. *Internet Histories*, 6(1-2), 113-132.

[49]Richardson, M., & Schankweiler, K.(2020). Introduction: affective witnessing as theory and practice. *Parallax*, 26(3), 235-253.

[50]Ringel, S., & Davidson, R.(2022). Proactive ephemerality: How journalists use automated and manual tweet deletion to minimize risk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social media as a public ar-

chive. *New Media & Society*, 24(5), 1216-1233.

[51]Stainforth, E.(2022). Collective memory o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Cultures of digital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Memory Studies*, 15(2), 257-270.

[52]Storm, B. C.(2011). The benefit of forgetting in thinking and remember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5), 291-295.

[53]Strokes, P.(2015). Deletion as second death: The moral status of digital remain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7(4), 237-248.

[54]Sturken, M.(2008). Memory, consumerism and media: Reflection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ield. *Memory Studies*, 1(1), 73-78.

[55]Tello, V.(2022). Counter-memory and and-and: Aesthetics and temporalities for living together. *Memory Studies*, 15(2), 390-401.

[56]Thach, H., Mayworm, S., Delmonaco, D., & Haimson, O. (2022).(In)visible moderation: 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marginalized users and content moderation on Twitch and Reddit. *New Media & Society*, 0(0).

[57]Tulving, E.(1985). *Elements of episodic memo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8]Urban, P.(2022). Blogs' archives and revision of the past: A case study. *Memory Studies*, 15(2), 318-331.

[59]Vallely, N.(2019). The relationality of disappearance. *Angelaki*, 24(3), 38-52.

[60]Van Dijck, J.(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1]Van Dijck, J.(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2]Van House, N., & Churchill, E. F.(2008). Technologies of memory: Key issues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Memory Studies*, 1(3), 295-310.

[63]Varis, P., & Spotti, M.(2011). In beloved memory of: Facebook, death and subjectivity. *Til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5(5), 1-11.

[64]Wessel, I., & Moulds, M. L.(2008). How many types of forgetting? Comments on Connerton(2008). *Memory Studies*, 1(3), 287-294.

[65]Wu, S., & Fang, H.(2023). Social media suspensions as dignity takings: Users' personal loss in "account bombing". *New Media & Societ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66]Yang, G., & Wu, S.(2018). Remembering disappeared websites in China: Passion, community, and youth. *New Media & Society*, 20(6): 2107-2124.

[67]Zhu, H., & Miao, W.(2021). Should I click the "like" button for my colleague? Domesticating social media affordance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5(5), 741-760.